

安史之乱背景分析

——唐前期边疆整体局势的紧张与东北一隅的相对安定

李 飞

摘 要：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有很多，从当时的背景看，唐朝国力的衰落，周边民族的崛起，当朝皇帝炫耀武功是主要因素。初唐时期“偃武修文”的方针没有很好的执行，府兵制的衰败，募兵制的流行，将剑刃握在了皇室的手中；在安禄山的势力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后，玄宗皇帝对安禄山的关爱，已经不仅仅是优宠，更是一种羁縻手段，安禄山最后的反叛，或许可以说，是玄宗皇帝对禄山进行羁縻策略失败的结果，同时也反映了唐朝皇室对整个东北进行羁縻策略的失败。

关键词：安史之乱；羁縻政策；东北；西北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0)增刊-0045-06

关于安史之乱，前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习惯、河北地区的状况、人为因素等方面都有过研究，本文主要从当时唐朝边疆整体局势的紧张与东北一隅的相对稳定方面做一个比较性的阐述，正是基于此种背景，安禄山才有了可乘之机。本文主要从唐前期的军事格局与兵力分布；唐廷精力在西北；唐前期中央政府对东北执行暂时的羁縻策略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希望对安史之乱的研究能有一点点新意。

一、唐前期的军事格局与兵力分布

(一) 军事格局

初唐时期，唐王朝执行“强干弱支”的政策，以维护王朝的统治。与府兵制相适应，全国兵力的重心在长安。唐太宗采取“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放弃了“耀威武，征讨四夷”的暴力政策，以稳定国内政局，发展生产，与民休息为主要目标，对边疆地区的军事行动十分慎重，即使在与周边民族发生战争之后，也采取了“抚九族于以仁”的较为宽厚的羁縻策略，因而国家局势是稳定的，国家在兵力布局上是安全的。此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吕思勉先生曾在其著作《隋唐五代史》中指出“唐室之兵威，至高宗时而极盛，亦至高宗时而就衰”^[1] (p. 130)。唐初武功，看似卓越，实皆乘敌国之敝，非由兵力之强。

收稿日期：2009-11-15

作者简介：李飞，男，山东潍坊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9）

故在高宗时,东西两面,业已遭受挫折;武则天,韦后时,府兵制度逐渐衰落,与此同时,周边民族势力不断崛起,引起了边疆局势的恶化[1](p.161)。玄宗时期,府兵制度已经不能提供充足的兵员,唐的军力布局随之调整,全国兵力的重心逐渐向边疆转移,而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其护卫兵力则日渐衰弱。通过募兵招募起来的军队,大部分集结在边境的节度使手中。如吕思勉先生所言,“当时,天下兵力,实以西北二边为重,以唐所视为大敌者,实为突厥与吐蕃也。然以重之之故,其制驭之亦较严。朔方、河、陇,多以宰臣遥领,或将相出入迭为之。而所用胡人,如高仙芝、哥舒翰等,亦不过贪功生事之徒;故未有他患。东北去中枢较远,奚、契丹虽桀骜尚非突厥、吐蕃之比,故唐视之较轻,所用节将,惟张守珪出于精选,亦仅武夫,不知远虑,而安禄山遂乘机,盗窃兵权矣”[1](p.185)。“然唐自太宗时,本无迫切之外患,而开边不已,高宗已后,国力日衰,而终不肯有所弃。于是玄宗继起,不得不重边兵,边兵重而安、史之乱作,节镇偏于内地,大局遂不可收拾矣”[1](p.138)。如此所说,唐朝在边境集结大规模边兵的同时也逐渐瓦解着旧有的军事体制。

唐长孺先生在他晚年撰写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曾就唐朝军事体制的改变进行过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唐代边疆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为避免远地调发,在军事上形成统一指挥,高宗以后,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长官。他列举了高宗仪凤二年(677)刘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

为例阐释这种军制的转变过程,这与他概括唐朝由战略攻势向战略守势的转变是互为呼应的。

唐初的军事地位处于战略攻势,由于实行的是府兵制,在当时具有短时间内迅速召集大量兵员的能力,因此,战则兵集将出,归则兵散将还,在边地没有集结大规模的兵力,只是遇到战事才派将领带兵出击。这反映出唐廷实力对比于周边民族势力是强盛的,不需要设重防,遇战事,只需临时调兵出击就可以抵御周边民族的进攻。从这一点上讲,唐朝总体地位是处于进攻态势的。但这种国家状态到玄宗时已经发生变化,十节度使的设置反映出唐朝已经处于防守的位置。虽然皇帝有拓边的野心,将领有邀功请赏的目的,但与周边民族势力相对比,唐朝早已处在防守的不利地位。

(二) 兵力分布

初唐时期,国家执行的是“强干弱枝”的政策,全国的兵力分布及来源主要是在关中地区。从折冲府的分布可以看出当时的兵力布局情况。武德时十二军的兵卒都出自关中诸府,目的在训练关中军民,向四方开拓。贞观时,全国共设府六百余,其中关中就占了二百六十一,目的也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2](p.90)。天授时,都洛阳,郑、汴、许、汝、怀、卫、泽、潞等州,成为王畿,于是汝、卫等州又增置兵府以资震慑。其后,随着局势的变化,唐又在河北和安西一带,分别设置或增加兵府。河北道兵府,是玄宗为防御奚、契丹增设的,据资料显示,至少有了四十六府[6]。

从表一可以看出初唐兵力重心是长安、洛阳所处的关中地区,唐十道折冲府数比较如下:

表一

道名	关内	河东	河南	河北	陇西	山南	剑南	淮南	岭南	江南	合计
府数	288	163	74	46	37	14	13	10	6	5	657
百分数	43.9	24.8	11.2	7	5.6	2.13	1.98	1.52	0.91	0.76	100

(此据《新唐书·兵志》及谷霁光《折冲府考》合编而成。)[7](p.373-375)

由此表可看出,关内和河东是当时的兵力重心,国家局势掌控于此,而后期随着唐玄宗在边疆设置节度使,这一局势已发生变化。唐朝局势的变化,不能全归咎于周边民族的野心。唐前期统治者开拓疆土的野心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唐高宗就曾为了开拓西部疆土,在安西都护府设置兵府,在龙朔元年,一共有折冲府一百二十六[5]。

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一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史籍言:“又于边境置节度使、经略使,式遏四夷。(凡节度使十,经略守捉使三。)大凡镇兵四十九万人,戎马八万余。每岁经费:衣赐千二十万疋段,军食则百九十万石,大凡数千二百一十万。(开元以前,每年边用不过二百万,天宝中至于是数。)”[5](p.1385)

从表二可以大略看出当时节度使的分布及国家的兵力布局：

表二

节度使名	安西	北庭	河西	朔方	河东	范阳	平卢	陇右	剑南	岭南	合计
兵员	24000	20000	73000	64700	55000	91400	37500	75000	30900	15400	486900

(此表据《旧唐书·志》卷三十八)[5](p. 1385)

由此可见,此时国家精力尽在边疆。

“高宗仪凤以后,随着边防形式日渐趋于守势,府兵制包括兵募防兵在内的普遍征发制的日益破坏,边镇驻军越来越多地招募久戍边境的边防健儿充当。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临时性统率远征的行军大总管逐渐演变为大军区的常任最高长官。这种军事长官起初名号纷繁,到玄宗开元时期,逐渐统一为节度使之称。一般认为,睿宗景云年间,开始出现这一称号。此后沿边陆续设置八节度。随着这一变迁,将军府署机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由临时变为常设”[6](p. 85)。“睿宗景云二年(711)以后,唐代东北、北部、西北部和西南部边境统帅名号逐渐统一为节度使。此后,与军务有关的支度,营田及转运等诸种使职又逐步由起初的专设改为节度使兼职”[6](p. 105)。

开元年间,府兵制的败坏,也让政府的兵源系统得不到保障。边疆聚集了大量的冗兵,而关中地区的兵员却得不到及时的补充。“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2](p. 90)的说法已完全不符合玄宗时期的情形。玄宗开元元年,令“羽林飞骑并以卫士简补”[7](p. 6679),这是与卫士缩短兵役年限同时颁发的一项法令。卫士已经不能定额,更从卫士中简补羽林飞骑,府兵日弱而禁兵日重。“先是,缘边戍兵常六十余万,(张)说以时无强寇,奏罢二十余万使还农,上以为疑,说曰:臣久在疆场,具知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若御敌制胜,不必多拥冗卒以妨农务。陛下若以为疑,臣请以阖门百口保之。上乃从之。初,诸卫府兵,自成丁从军,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杂徭,浸以贫弱,逃亡略尽,百姓苦之。张说建议,请招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上从之,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隶诸卫,更番下上。兵农之分,从此始矣。(史言唐养兵之弊始于张说)”[7](p. 6753),“开元十一年,戊子,命尚书左丞萧嵩与京兆、蒲、同、岐、华州长官选府兵及百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一年两番,

州县勿得杂役使”[7](p. 6757)。《新唐书》卷五零《兵志》记载“天宝八载(749),停止折充府上下鱼书,是法令正式承认‘无兵可交’,停止上番的事实,折充府的活动乃全部停止。”中原地区皇帝的禁卫军也要通过招募才能满足保障,在“偃武修文”的风气影响下,大唐帝国的外围处于战火连绵的境地,里面确是修饰太平,不修武备。此刻的中原地区对武备是很轻视的。《唐会要》卷七十二“军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于是挟军器者有辟,蓄图讖者有诛,习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之不齿。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死不闻战声。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缦彩,食梁肉,壮者角抵拔河,翹木扛铁,日以寝斗,有事乃股栗不能授甲。其后盗乘而反,非不幸也。”这反映出,玄宗末年,当时中原地区为了统治稳定,修饰太平,轻武风气浓厚,且禁卫兵也严重缺乏战斗力。

(三) 禁兵

唐肃宗时,李揆所谓“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区别,更相检伺”[8]。南衙即诸卫之屯于宫南者,在长安太极宫前朱雀门内;北衙即禁兵之在禁苑内者。北衙军队在唐代一开始就成立了,史言“南北禁军”,即合卫府兵与禁兵而言,禁兵主要为羽林屯兵,屯于玄武门,又称北门屯兵。武德时,建成以太子置“宫甲”,分屯于左右长林门,号长林兵,也属禁兵之列[5]。北门屯兵又号“元从禁军”,是从太原起兵而愿意留下宿卫的,约三万人,年代久远,以其子弟补入,又称“父子军”,屯于北门专任宿卫,因此又称“北门屯兵”。贞观时,太宗选其中善于骑射者组为百骑,则天时发展为千骑,睿宗时发展为万骑,到玄宗时设置为左右龙武军。高宗时设置了左右羽林军,肃宗时又成立了左右神武军,总称北衙六军。禁卫军队在肃宗时设置的有左右神武军,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

军。北衙六军与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合成北衙十军。这是整个唐朝时期的禁军情况,但在玄宗及以前,常在的禁军就是左右羽林军与左右龙武军这四支部队。但禁军后期也很是腐败“六军诸卫市人,富者贩缯彩,食梁肉,壮者角抵、拔河、翹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授甲”[8](p. 1325)。以致玄宗在逃往四川的路上仅有六千人跟随。一个大唐帝国的皇帝出走长安,竟只有六千人跟随,可见当时禁军实力的腐败不勘。

从以上所举军事格局、兵力分布和禁军战斗力三个方面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知道,玄宗时期,周边民族势力处于成长崛起时期,而唐朝的实力虽然与初唐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程度的飞跃,但中央在掌控现有军队方面已经与初唐时期不可比拟,包括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力及募兵方面。

二、唐廷精力在西北

龙兴于关陇地区的唐朝皇室,长安、洛阳为核心的关中地区是其根本。观整个唐朝疆域,西部边疆部族众多,而突厥与吐蕃又是两个极强悍的民族。西部关系处理的好坏,决定着唐朝的统治稳定与否。

开元天宝年间,玄宗皇帝先后“置十节度使、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使抚宁西域(略),兵二万四千。北庭节度使防制突骑施,坚昆(略),兵二万人。河西节度使断吐蕃、突厥(略),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使捍御突厥(略),兵六万四千七百人。河东节度使与朔方犄角以御突厥(略),兵五万五千人。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略),兵九万一千四百人。平卢节度使镇抚室韦、靺鞨(略),兵三万七千五百人。陇右节度使御吐蕃(略),兵七万五千人。剑南节度使西抗吐蕃,南抚蛮獠(略),兵三万九百人。岭南五府经略绥静夷、獠(略),兵万五千四百人。(略)凡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疋”[7](p. 6847)。从上文可以看出,十节度使的设置,完全是为了防御边地各个民族势力而采取的措施,旨在保卫以长安、洛阳为核心的本部地区,这与唐朝建立初年太宗向周边开拓扩展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节度使本身是军事制度,反映了唐朝军事格局的变化。但是从实质上讲,它是唐朝与周边民族之间势力斗争

的产物。因为周边民族势力的崛起,特别是吐蕃、突厥对唐的频繁侵扰,才迫使唐朝加强边疆防御。

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一书中指出,唐朝的大敌是突厥与吐蕃。“当时,天下兵力,实以西北二边为重,以唐所视为大敌者,实为突厥与吐蕃也。然以重之之故,其制驭之亦较严。(朔方、河、陇,多以宰臣遥领,或将相出入迭为之。而所用胡人,如高仙芝、哥舒翰等,亦不过贪功生事之徒;故未有他患。东北去中枢较远,奚、契丹虽桀骜尚非突厥、吐蕃之比,故唐视之较轻,所用节将,惟张守珪出于精选,亦仅武夫,不知远虑,而安禄山遂乘机,盗窃兵权矣。正是处于对西北地区的重视,才会在择将方面慎之又慎”[1](p. 130;185)。

唐廷在对驻守西北地区的将领进行慎重考察的同时,也将关中地区的壮丁尽量征发,以致关中地区兵力空虚。“丁酉,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瓘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瓘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息讨击,……敕许之。将作大匠韦凑上疏,以为:今西域服从,虽或时有小盗窃,旧镇兵足以制之。关中常宜充实,以强干弱支。自顷西北二虏寇边,凡在丁壮,征行略尽,岂宜更募骁勇,远资荒服!……昔唐尧之代,兼爱夷夏,……汉武穷兵远征,虽多克获,而中国疲敝”[7](p. 6712)。“自顷西北二虏寇边,凡在丁壮,征行略尽”从这也可以看出,西北二虏,对唐的威胁是严重的,正是由于西北二虏对唐的侵犯,才致使关中地区,“凡在丁壮,征行略尽”,不能再征集骁勇,去送死了。“关中常宜充实”,关中地区应该充实一下兵力了。从这段材料可以看出,关中地区兵力已经严重不足,强干弱支政策,已经颠倒,即使一万人的征集,都遭到大臣的反对,按照正常的想法,一万人的部队是不多的。一个泱泱大国,是可以很容易的提供出来的。这“西北二虏”应该是突厥与吐蕃,这点从下面的两则材料也可以证实出来。

开元十三年(725),张说建议唐玄宗封禅泰山,并要作好兵防工作,防止突厥乘机会入侵。“说以大驾东巡,恐突厥乘间入寇”[7](p. 6764),开元十五年(727),“十二月,戊寅,制以吐蕃为边患,令陇右道及诸军团兵五万六千人,河西道及诸军团兵四万人,又征关中兵万人集临洮,朔方兵万人集会州防秋,至冬初,无寇而罢,伺虏入寇,互出兵腹背击之”[7](p. 6781)。这次防备吐蕃的秋防

行动,动用了陇右、河西、关中、朔方四个地区共十一万六千人,这次秋防行动是大规模的,九大节度使一共四十九万人,从人数上看占了五分之一强。从这两则材料,可以看出,至少在开元期间,突厥、吐蕃对唐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当然在这一危险面前,唐朝布置在此线的兵力也是充足的。按照表二的比例计算,陇右、河西、朔方、河东四个节度使的总兵力是二十六万七千七百人,居总兵力的55%弱。范阳、平卢这两个节度使的总兵力是十二万八千九百人,居总兵力的26%强。从节度使的兵力分配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相对于边疆的其他地方,唐朝廷对西北边疆是极为重视的,国家兵力也多放于此。而且,中央在对这几个方面的将领的选择上也是较为严格的。

从武则天当朝开始,至玄宗时期,唐朝与周边部族的关系,总的说是趋于紧张的,一方面是唐朝兵源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周边部族总体势力的上升。武则天朝,女皇当政,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政权的稳定方面,对周边缺乏强有力的政策。玄宗时,却相反,有好武功的倾向。从713—755年,唐对吐蕃用兵26次,对突厥用兵12次,对契丹用兵9次,对奚用兵2次,对南诏用兵6次,其中对吐蕃与突厥共用兵38次,对契丹、奚共用兵11次,在这些战役中,唐朝军队是经常吃败仗的,死亡过好几个大将如郭英杰、王天运等等[4](p.84)。再有其他方面的部族的反抗斗争,唐朝的边境局势是烽火不断,战火连绵。张说在722年奉命巡边,在《幽州新岁作》一诗中提到:“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常建的《塞上曲》:“翩翩云中使,来问太原卒,百战苦不归,刀头怨明月。塞云随阵落,寒日傍城没,城下有寡妻,哀哀哭枯骨。”反映了太原地区凄冷战局。常建在其《塞下》和《塞下曲》中分别写道:“铁马胡裘出汉营,分麾百道救龙城,左贤未遁旌竿折,过在将军不在兵”;“龙斗雌雄势已分,山崩鬼哭恨将军,黄河直北千余里,冤气苍茫成白云。”常建的诗反映了唐朝与突厥的战争凄惨,将领贪功而不顾士兵性命,士兵的厌倦情绪,“冤气苍茫成白云”就是很好的明证。“百战苦不归”“哀哀哭枯骨”等也从侧面也反映了唐朝与周边部族的关系紧张,战争次数繁多,边境局势动荡不安。虽然诗作艺术化总有夸大之辞,但也会从总体上反映当时的一些真实

情况。

三、唐朝对东北暂时的羁縻策略

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破之于青海”开始,唐与吐蕃的战争趋于频繁,当时,崔希逸已与吐蕃守将乞力徐,“刑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但因孙诲自欲求功,“惠琮等至,则矫诏令希逸袭之……自是吐蕃复绝朝贡”[7](p.6827)。从此开始,唐的西部边疆与吐蕃开始了拉锯战。

唐朝在西北进行绵绵战争的同时,需要避免东西两方面作战,以免出现腹背受敌的情况,稳定东北也可抽出较多的兵力财物支持西北战争。玄宗之前,东北局势相对稳定。史载“幽州大都督薛讷镇幽州二十余年,吏民安之,未曾举兵出塞,虏亦不敢犯。与燕州刺史李进有隙,进毁之于刘幽求,幽求荐左羽林将军孙佺伐之。三月,丁丑,以佺为幽州大都督,徙讷为并州长史”[7](p.6672),“庚申,幽州大都督孙佺与奚酋李大湫战于冷陁,全军覆没。大湫谓佺曰:朝廷既与我和亲,今大军何为而来。佺曰:吾奉敕来招慰耳,楷洛不禀节度,辄与汝战,请斩以谢。大湫曰:若然,国信安在”[7](p.6672)。薛讷镇守幽州二十余年,从先天元年往前推二十年,即692—712年,这期间,幽州是稳定的,吏民安之。“曾举兵出塞,虏亦不敢犯”可以看出,唐朝在幽州的实力是很强大,周边民族不敢侵犯,当然前提是“未曾举兵出塞”。

玄宗时期,情况发生变化,“先天元年(712)十一月,乙酉,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景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略),开元二年(714),初,营州都督治柳城以镇抚奚、契丹,则天之世,都督赵文翔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是后寄治幽州渔阳城”[7](p.6678,6695)。此后,唐廷为维护东北地区的稳定费劲周折。为避免腹背受敌,唐朝对东北的奚和契丹采取了羁縻政策,主要表现在和亲方面。和亲是古代国家惯用的外交策略,是与战争并行的两大主要策略之一。和亲是联盟的一种最高级的方式,可以称为是一种“血亲”形式的政治军事联盟,与历史上惯有的“养子”具有异曲同工之效。从形式上讲,“养子”级别还是低于

“和亲”的。在“和亲”条件达不到满足的前提下,“养子”就是一种可以信赖的形式。安禄山与其八千“假子”就是一种形式上的较旁人更可信赖的联盟。

唐朝对东北的羁縻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贯穿玄宗朝的对奚、契丹的和亲;二是颁赐封号。唐朝皇室对公主外嫁甚为重视,每位公主出嫁外族,总会陪以巨额的资财,以示关爱。贯穿整个唐

朝,有18位公主下嫁外族酋长共17次,其中玄宗时期为9位(开元时期6位,天宝时期3位),占唐代和亲人数的一半,而这9位有7位下嫁给奚、契丹,可见玄宗时期对奚、契丹的重视。从表三可以看出,天宝时期的3位公主从血缘上讲与玄宗的关系最亲密,这或许从侧面也可反映出当时问题的一方面。

表三

封号	原身份	和蕃年代	下嫁之蕃族
固安公主	玄宗从外甥女辛氏	开元五年	奚
永乐公主	东平王外孙杨元嗣第七女	开元五年	契丹
金河公主	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	开元五年	突骑施可汗
燕郡公主	余姚公主女慕容氏	开元十年	契丹
东华公主	玄宗从外甥女陈氏	开元十四年	契丹
东光公主	咸安公主女韦氏	开元十四年	奚
和义公主	玄宗从弟李参第四女	天宝三年	宁远国
静乐公主	玄宗外甥女独孤氏	天宝四年	契丹
宜芳公主	玄宗外甥女杨氏	天宝四年	奚

(据《唐会要》卷六、《册府元龟》卷九七九、《旧唐书》、《新唐书》及《资治通鉴》制。)

一般情况下,奚、契丹是不会主动进攻唐朝的,大多数情况下,奚、契丹侵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边将处理当地关系不当才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恶化。唐一向视西北方向的突厥与吐蕃为大敌,因此,需要尽可能的安抚东北的奚、契丹,集中主要力量与吐蕃对抗。所以,和亲其实是不得已之下采取的一种暂时的羁縻政策。

天宝后期,安禄山在东北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后,玄宗对安禄山的宠爱已经超越了君臣之间的关系。这与其说是宠爱,信任,不如说是对禄山实行的一种羁縻策略。玄宗曾对契丹松漠都督涅礼说过“卿之蕃法多无义于君长,自昔如此,朕亦知之”[7](p.6812),即蕃人的习惯是多不忠于君长的,安禄山是胡人,难道玄宗这样的明君会糊涂至此吗?

四、结语

重视西北,轻视东北,护卫长安、洛阳为核心的京畿地区,这与“强干弱支”政策是相对应的。唐前期在河北地区不设置兵府,到玄宗时期增设兵府,这一过程与此也是相对应的,从唐王朝建立

一开始,河北就被认定为护卫中原王朝的一个缓冲地带,东北蕃族对中原的威胁程度,影响着这种情况的变化。因此,可以说,玄宗皇帝对安禄山实行的羁縻策略的失败导致了安禄山后来的叛乱。

参考文献:

- [1]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2] (清)纪昀.四库全书.(宋)王溥.唐会要[Z].北京:中华书局,1995.册607.
- [3] (宋)王应麟.玉海[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唐折冲府考校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
- [4] 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5] (后晋)刘昫.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宋)王溥.唐会要[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宋)乐史.太平寰宇记[Z].北京:中华书局,2007.(后晋)刘昫.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7]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Z].北京:中华书局,1956.
- [8] (唐)欧阳修.新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82.(后晋)刘昫.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

(责任编辑:月车)